

几位大学生和一所渴望春天的小学

□本报见习记者 陈彬

6月,漫天飞雪。
教室里,年轻的语文老师向窗外看了一眼,然后转过身。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这节课的题目:春天来了。他觉得这节课很不好讲,因为眼前的这些学生从出生到现在,从没有真正体验过春天的感觉。
这里是位于藏北高原的西藏自治区仲巴县仁多乡小学。海拔近5000米,终年严寒,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30%~40%。这里没有春天,六月飞雪是最普通的天气。
2003年,一位叫普琼的藏族老师自愿来到这所小学。耕耘多年,他被评为了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。今年年初,西藏教育厅委托中国传媒大学拍摄一部关于普琼的纪录片。于是,该校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和三位学生组成摄制组,来到了这所没有春天的小学。

必不可少的“陪同团”

为拍摄纪录片,摄制组于今年3月和6月两度进藏,共历时35天。然而,他们在仁多乡小学总共的拍摄时间却只有短短的5天。剩余的30天,他们都在干什么?
“有几天是在普琼的家乡拍摄,有几天是因为高原反应太厉害,不得不休整一下,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路上。”担任纪录片执行导演的电视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徐咏说。

从北京到拉萨,再到日喀则,然后到仲巴县,最后驱车赶往仁多乡,这样一趟下来,便需要大概一周时间。每到一地,当地政府就会派专门人员全程陪同。走到仁多乡时,已经有了一个规模不小的“陪同



在摄制组的镜头下,普琼为学生辅导功课

团”。对于这种看似有些“官僚”的做法,摄制组开始有些抵触,但当他们了解到实情,才知道这种做法并非毫无必要。

“因为这里地广人稀,环境极其复杂,某地的具体情况只有当地人才了解。所以每到一处,就只能多增加一名当地陪同人员才能保证安全。”担任纪录片摄像的研究生付托解释道。

仁多乡当地环境的恶劣由此可见一斑。

在仁多乡的几天,缺氧、高原反应、恶劣天气、物资短缺都给拍摄团队带来了不少麻烦,但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里的严寒。3月的夜晚,他们住宿的房间温度甚至可低至零下,几个人睡觉时根本不敢脱去衣物,还要带上帽子,另外盖上3床被褥才能睡着。到了6月第二次进藏,情况稍有好转。“至少能到零上了,大概一两度吧。”徐咏说。

也正因为如此,摄制组的几个人对彼此的健康格外关心,每天早晨,相互询问身体状况成为了他们的例行公事,甚至细致到关心每个人每天的排便是否正常。“排便不好,就说明身体可能有问题。在这里,一点小病都可能危及生命,真的马虎不得。”负责此次录音任务的学生孙建这样说。

风雪中的“一剪梅”

摄制组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拍摄已经成为仁多乡小学校长的普琼。但没过多久,他们就发现普琼在镜头前总是略显紧张,且言语也不多。于是他们决定转变角度,多拍摄一些普琼身边的老师,没想到在这些老师身上,摄制组感受到了另一份强烈的震撼与感动。

让徐咏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夫妻教师,丈夫从西藏大学毕业后便来到这里教学,在学校和他的妻子相识。谈到当初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教书时,丈夫说他在小学时读到了一篇文章,文章讲述了一位西藏阿里地区普通教师的故事,他被那位教师的精神所感动,于是立下志愿,长大也到海拔地区从教。最终,他实现了愿望。

“当我问他坚持从教的动力时,他很淡然,说这是他的梦想,既然实现了就要



孙建(左)、徐咏(中)、付托(右)在藏北高原

好好干。”徐咏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他根本不会相信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,还有这么一位为理想如此执著的人。

本文开头中那位有些无奈的语文老师叫归桑,1989年出生的他是这所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,却已是一年级的班主任了。归桑每月的工资并不高,但除了维持正常生活外,他还要省下钱供家里的几位哥哥姐姐上学。当摄制组问他如何看待那些工作一段时间便离开的老师时,归桑说没什么。之后,这位藏族大男孩沉默许久,用他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成熟说出了四个字——人各有志。

在归桑的宿舍,摄制组问他平时喜欢听什么歌。归桑说是一些老歌。开始人们以为会是一些藏族歌曲,但当他打开电脑,传出的却是费玉清的名曲“一剪梅”。此时,窗外的六月雪还在下个不停。寒风凛冽、大雪纷飞中,那段熟悉的旋律传递给每个人的却是一种别样的心情。

雪花飘飘,北风啸啸,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剪寒梅,傲立雪中,只为伊人飘香……

“看到他们落泪,我踏实了”

从西藏回来后,摄制组开始了紧张的后期制作。9月13日,一场专门为这部题为《为了孩子》的纪录片召开的座谈会在

中国传媒大学举行。会上播放了这部纪录片的初版,会议组织方还特意邀请了几位在传媒大学就读的西藏学生。

当时,徐咏的心情很是忐忑,不知放映效果如何。他尤其在乎那几位西藏学生的感受。但当纪录片结束时,他看到那几名藏族学生落泪了。那一刻,徐咏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,他知道这部纪录片已经成功了一大半。

“我们不想过分地渲染某种气氛,只是想通过镜头,将我们看到的、也使我们感动的场景呈现出来,这种真实才是最具感染力的。看到他们流泪,我知道他们已经认可了我们的真实,我觉得很欣慰。”徐咏说。

对于这部短时间内“仓促”而成的片子,何苏六觉得尽管有着诸多不足与遗憾,但总体上还算满意,而对于他手下这三个“学生兵”,他的评价却颇高:“能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完成拍摄任务,这三个学生‘没的说!’”

在那场座谈会结束后不久,付托的一位观看过该片的师妹给他发来一条近300字的短信。大致意思是说,不知道为什么,这几天她一直忘不了纪录片中的情景。仔细想想,她觉得片子里好像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,那些人也谈不上有多伟大,但那些人、那些事却总是在她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,怎么赶也赶不出去……

中国大学评论

中国的教育问题与问题教育

□顾海兵

正如对青年问题与问题青年的理解一样,一般来说,教育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改良,是在基本体制不动的条件下对教育作一些修补,是局部创新;问题教育则主要涉及的是改革,是对基本体制作不低于30%甚至50%以上的改造、再造,甚至是创造,是整体性创新。

对中国教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,在百度上检索“教育研究”,其中多数是改良性的,很少是改革性的。有人认为,教育与经济不同,教育不能产业化、商业化等等,经济需要改革,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,而教育由于其非经济、特殊,所以不能模仿经济改革。笔者以为,中国的教育已经不能用教育问题来涵盖,中国的教育就是问题教育。

大概数千年来,学校都一直被认为是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,所谓韩愈的《师说》。据网络检索,唐贞元十八年(公元802年),韩愈在翰林院当教授,主讲儒学必修课中的四门。当时有个男同学叫李蟠。李蟠听韩愈讲课,总是第一个早起在教室第一排占座。上课时随时笔记,做认真读书状。韩教授很高兴,就写了一篇古文送给他,题目叫《师说》,包括: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?惑而不从师,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。”

《师说》的研究众多,这里不予讨论。仅就“师者”或学校,“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作点分析。

学校究竟是什么?按照上面的资料或流行的说法,学校是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地方,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。笔者以为,这样的解释最多只对了一半。为什么?这要从学校的校这一汉字的解构寻找答案。

首先简单说一下汉字来源的一些论点。关于这一点,目前可以肯定地说,汉字的历史最少5千年;汉字如何创造出来没有标准的唯一的权威的答案;汉字的发展由少到多,汉字有不少于一个以上的来源;任何人都无权解释汉字的来源或本质;汉字演化到今天,包括简化字,有它的客观规律,少数人不可能阻碍社会的认定;汉字还会继续简化、优化。

其次,与其他文字不同,汉字是义、形、声的结合,初始的汉字以形为主,如人,后来的汉字以义为主,如个、从、众;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细胞,都是一座可以挖掘的金矿。这里,笔者拟对学校的校字作一解构,从这一解构中我们就可以理解学校的本质究竟是什么。

校的结构:左边是木,右边是交。这样的组合是说:校是一个交流的地方,是在一个有木的地方交流。校的本质就是交流,是精神的沟通,这样的沟通在有花草树木的地方是最佳的,所以,学校是精神校园与物质校园的组合。

学校的这种交流包括三种:学生之间的交流,老师之间的交流,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。如果假定三种交流同等重要,则把学校理解为传道授业解惑,显然是太不够了,它只解释了学校的1/3功能。而据国外专家调查,学生在校所获取知识的70%并不是来自于老师,而是来自于同学。如此,把学校理解为老师对学生的传道授业解惑则连1/3都解释不了。学校有师生之形,无师生之实,学校之实就是交流,平等的交流。也许韩愈说的是对的,人人都是师,人人都是生,但后人将其断章取义了。

由校字的解构,把学校作为附属政府的地方,把校长作为有官级的人,其荒谬不值一驳;由校字的解构,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人格是学校的必然之土壤;由校字的解构,真正的学校一定不是“选拔”学生比分数,而是“选择”合适的学生做合适的事;真正的学校一定是充满灵感、碰撞、火花、辩论,一定是具有活力、创造力、创新力的;真正的学校一定不是问题学校,但一定存在学校问题。

笔者认为,传统文化的缺陷阻碍教育的创新,使教育不能成为真正的教育。

传统文化的优点几乎不需要解释,因为它的存在、持续存在,说明了它的客观性、必然性,但笔者以为,传统文化一定存在问题,也许是个问题传统,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与创新,阻碍了中国教育成为真正的教育。笔者以为,传统文化至少有三大问题:求全(所谓全面发展),不重视数据,不重视田野调查,喜欢闭门读书。关于这一点,笔者打算另文论述,此处点到为止,争取抛砖引玉。

最后介绍刚刚看到的材料:2009年,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,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虽然排名世界第一,但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,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。老生常谈,已经见怪不怪了!

人物

慈爱如父的严师

——记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

□本报记者 张楠 通讯员 马金铭 陈明

这是一双苍老而依然灵巧的手。

这双手,曾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记录叶企孙的思想,曾在哈军工的黑板上写下E=MC²,曾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造出中国第一个环形激光器。

这双手,属于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。

“当高院士的学生,太难了”

高伯龙作为激光技术领域的领军专家,慕名学子数不过来。然而,高伯龙治学严谨,对学生要求严格,在国防科技大学是出了名的,他指导的博士生读六七年是常事。
“高院士的学生,太累了。”
攻读博士学位,加班加点是常事,而高伯龙的学生却尤其多。2010年6月,某系统样机研制进入关键阶段,高伯龙带领博士生们昼夜讨论问题、分析数据、确定方案。那段时间,他们的生活彻底以实验为中心。有一次修改实验方案,他们从下午一直讨论到晚上8点才确定新实验方案,开始启动系统进行实验,然后就各自回家吃饭。晚上11点半的时候,正在准备论文的博士生小王接到高伯龙的电话,要他马上到实验室。他们观察新取得的实验数据后,觉得不太理想,决定重新实验。直到得到了理想的数据,他们才离开实验室,此时天已经快亮了。而这样的事情,他的学生都曾遇到多次。

“高院士的学生,太苦了。”
在学术期刊上多发论文,是许多研究生的重要任务,而高伯龙并不要求他指导的博士生多

写多发文章。他要求他的学生没有原始创新的论文不要发,阶段性成果的论文要少发,把主要精力放在工程应用研究上,把问题彻底研究清楚了再写文章。结果,他的学生往往从材料准备到最后完成文章,需要一两年甚至更多时间。

高伯龙院士所培养的学生数量之少,与他和他的学生取得的成就之大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他的学生,有的已成为共和国的将军,有的成为激光领域的知名专家,也有的虽然年纪轻轻,却已崭露头角。

“高龄”编程高手

1954年,由于工作需要,年轻的高伯龙被选调到哈军工任教,这位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一头扎进物理教研室,在他钟爱的理论物理世界中遨游。

然而,历史却最终让他改变了人生轨迹,将自己的选择毫不犹豫地标定在祖国的需要上。

上世纪60年代,在激光诞生后不久,“环形激光器”作为新型导航设备的核心,引起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的普遍关注,然而,所有人都没有料到,这项科研竟会如此之难。

1971年,在钱学森建议下,国防科技大学成立了激光研究实验室,并调入高伯龙从事相关研究。依靠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,在其他人在研究国外环形激光器设计思路的时候,他就提出全新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案。

1978年,高伯龙率领团队研制成功第一代环形激光器实验室原理样机,1984年又研制成

功某型环形激光器实验室样机,解决了大量理论和技术问题。

然而,要使原理样机过渡到实用阶段,还需进行工程化处理,而其中的关键技术——基础工艺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,根据我国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,要突破这道难关几乎不可能。高伯龙却认为,作为当时国内唯一坚持研制工作的实验室,不干,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。因此,他毅然决定,放下多年的理论研究,把研究方向转入基础工艺。

高伯龙把实验室变成了“生产车间”,潜心搞起基础工艺研究。为了研究的需要,近60岁的高伯龙重新当起了学生,开始自学计算机相关知识。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刻苦的钻研精神,他很快成了编程高手,编写的计算机程序解决了研究工作中的大问题。

1993年初,国内某重要装备研制进入关键阶段,有关部门督促国防科技大学在1994年底前完成环形激光器工程样机研制。此时,他们的攻关卡在了镀膜这道世界性难题前。高伯龙决定背水一战,在实验室成立攻关小组。为了突破技术难关,高伯龙像着了魔,更加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。老伴把饭送到实验室,他却埋怨老伴打断了他的思路,心疼他的老伴委屈地说:“以后再也不给你送饭了。”

在高伯龙的率领下,实验室经过连续奋战,终于在规定时间内研制成功某型号环形激光器工程化样机。并于当年11月在北京通过了专家鉴定。在此期间,高伯龙还率领技术人员研制成功了全内腔绿色氦氖激光器,使我国成为继美国、德国之后第三个掌握这种制造技术的国家。

他把学生当亲人

在外人看来,高伯龙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,眼中心里只有激光,平时不好打交道。但了解他的人都知

道,高伯龙既关心国家大事,又关爱同事家人,工作起来严肃认真,生活中却和蔼幽默,至情至性。
在科研上,高伯龙是永不停歇的发动机。2008年初,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长沙,电力供应极其紧张。那段时间,实验室只有晚上有电。当时学校已经放假,课题组的小伙伴们都开始准备欢度春节了。但是高伯龙却没有丝毫松懈的念头,为了工作,他白天睡觉,晚上做实验。博士生小文回忆,“那段时间,校园里积雪很深,高老师穿着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着,坚持每晚到实验室来观察数据,指导试验,而且总要一直工作到清晨停电后,才步履蹒跚地回家。即将满80岁的老人了,我们这些学生看着既钦佩又心疼”。

高伯龙在学术上极其严谨细致,学生撰写的论文,他往往仔细推敲,提思路、出观点、改论述,却从不在论文上署名。

高伯龙虽然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很严,但平时却把学生当做亲人一样,关爱有加。博士生小韩有一段时间肠胃不太好,高伯龙听了之后很担心,催促他赶紧去医院检查,并多次询问病情,直到小韩痊愈。后来高伯龙了解到学生们平时容易耽误就餐时间,经常到外面的小餐馆解决吃饭问题,立刻要求学生以后不要图方便,要把卫生放到第一位。

在生活中,高伯龙是一个慈祥而又不失幽默的老人。除了醉心于激光研究,高伯龙还喜欢阅



高伯龙

读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。年轻时读过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,书中典故至今能信手拈来,对鲁迅先生的作品也很熟悉,有一次跟学生聊天,提起《聪明人、傻子和奴仆》,他还开玩笑地给在场的人对号入座。

虽然年事已高,高伯龙仍每天坚持读报纸、看电视,关注国家大事,而且喜欢与当过教师的老伴讨论,写时评。他的象棋下得好,经常与家人、朋友对弈,赢了固然高兴,偶尔输了却也非常开心。